

假院士忽悠成“真”的反思

编者按

近期，一则关于“中国科学院院士阮少平”身份造假新闻引发舆论热议。经由多家媒体持续报道，这位多年来利用假身份招摇撞骗，混迹于学校、企业、医院、行业论坛等场合的“阮院士”被逐步揭露出真面目。多家央媒先后发表评论文章或视频，呼吁关注假院士背后暴露出的更多问题。无独有偶，据媒体近日报道，另一位号称“苏辙第41代后人”的“俄罗斯院士”苏文被公开举报造假。

近年来，像阮少平、苏文这样的伪专家不时就会冒出来。伪专家何以时常出现？如何铲除伪专家生存的土壤，根治伪专家产生背后的真问题，守住公众思考、求证与判断的能力？

谁在“头衔崇拜”中迷失？

◎ 樊耀文

假院士之所以能在多个领域畅行无阻，根源在于一些单位、机构存在“头衔崇拜”或者说“帽子崇拜”。当“院士头衔”成为衡量人才价值的重要甚至唯一标尺，那些单位、机构就要为假院士之类闹剧付出沉重代价。可以说，它们对头衔的饥渴、对“帽子”的狂热追逐，是假院士之类的伪专家得以招摇撞骗的温床。

企业在“头衔崇拜”中迷失，源于对“头衔背书”的过度依赖。为了给产品贴金、给品牌“壮胆”，一些企业把“有没有院士‘站台’”等，当成市场竞争的“绝招”。明明是普通技术，只要挂上“某某院士指导”等名头，就能抬高身价；明明是常规项目，只要能拉来几个有头衔的人“站台”，就能骗取合作方信任。这种对“帽子”的饥渴，让他们对头衔的真实性“睁一只眼、闭一只眼”。只要有伪专家“站台”，能唬住客户、撑足场面，就甘愿提供舞台，甚至主动帮伪专家包装宣传。

学校在“头衔崇拜”中迷失，藏在对“帽子数量”的盲目攀比里。为了学校或学科排名、为了争取更多办学资源，把“拥有多少专家”当成办学政绩的硬指标。只要头衔够响亮，就给高薪、配团队、拨科研经费，至于对方是否真能搞研究、育人才，反倒成了次要的。这种“帽子崇拜”让学术评价彻底变味，也让假院士有了混入高校甚至中小学、骗取科研资源的可乘之机。

如何根治假院士之类乱象？

◎ 徐刚

阮少平假院士事件是一面多棱镜，照见了从个体失信到制度失效的全链条漏洞。根治假院士之类乱象，需从源头治理，系统施策，构建起单位或机构把关、部门监管、法律震慑、社会回归理性的综合防线。

一是要筑牢审核的第一道防线。既然部分单位、机构的审核机制形同虚设，那么，根治乱象，首先就要压实邀请单位、机构的主体责任。单位、机构在邀请专家时应建立双重核查机制：一方面，要通过中国科学院官网及其学部工作局电话等官方渠道核实身份；另一方面，要求对方提供学术成果、任职证明等佐证材料。同时，要建立审核失职追责机制，对于因审核不严导致假院士入场、造成公共资源浪费或社会不良影响的单位、机构，应依法依规追究其主要负责人及直接责任人的责任。唯有让相关单位、机构从追捧头衔转向敬畏规则，才能从源头上切断假院士的“入场通道”。

二是相关部门需要强化监管，打造透明可信的信息查询网络。当前，中国科学院院士名单已公开可查，但有专家指出，信息分散、核验不便仍

一些机构在“头衔崇拜”中迷失，体现于对“头衔降容”的病态追求。办论坛要邀请尽可能多的“院士”“教授”才显得高端，开峰会要凑齐“权威专家”才觉得有分量。据报道，在一些活动主办方眼里，嘉宾的头衔比论坛、峰会内容更重要，名单的表面“含金量”比思想碰撞更关键。为凑齐想要的“帽子”，他们对头衔的真伪疏于核查。这种对“头衔崇拜”的执念，让假院士能轻易混进一些场合刷存在感、积累人脉，进一步包装自己。

一些政府部门的迷失，则体现于对“头衔权威”的过度迷信。做决策时，觉得有“权威专家”论证就一定靠谱，有“权威专家”背书的项目就必须支持……这种对“帽子”的盲从，让一些假院士凭借虚假头衔参与政策决策、项目评审，甚至影响公共资源分配。他们抛出的伪理论、假方案，因为顶着“权威”头衔，反倒比真正务实的建议更容易被采纳，最终可能造成公共利益受损。

正是这些单位、机构对头衔的饥渴和对“帽子”的崇拜，导致形成一个畸形的供需链：需求端疯狂追逐头衔，供给端就有人造假满足需求。假院士等是这一链条上的“产品”。相关单位、机构看似是受害者，其实是始作俑者，正是他们的非理性追捧，让假院士等有了生存空间，也让学术生态、市场秩序、公共决策等一次次被搅乱。揪出假院士等人只是开始，铲除“头衔崇拜”的土壤才是关键。

是一个问题。相关部门应构建“一站式”院士信息共享平台，整合院士履历、学术成果、社会任职等数据，并与政务系统对接，实现实时比对、一键验证。此外，需要建立快速响应机制：一旦接到举报或发现造假嫌疑，立即启动调查，通过官方渠道澄清事实。例如，可设立“学术打假”专项举报平台，鼓励公众监督，形成“全民把关”的态势。唯有让真院士信息在“阳光”下可见，假院士才无处遁形。

三是提升法律威慑力，让招摇撞骗者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。现行法律对假冒院士的惩戒明显不足。有法律专家指出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虽设有“招摇撞骗罪”，但实践中对学术头衔造假的量刑普遍偏轻，且多以行政处罚替代刑事追责，难以形成有效震慑。比如，阮少平在多年行骗中，通过虚假身份获得巨大利益，违法成本却远远低于收益。因此，根治乱象必须祭出法律利剑，构建“民事赔偿+行政处罚+刑事追责”的立体惩戒体系。

在刑事层面，应明确将“冒用两院院士、国家级人才头衔”认定为“招摇撞骗罪”的加重情节，对于造成科研资源浪费、财产损失或恶劣社会影响的，依法从重处罚，扭转“违法成本低、守法成本高”的失衡局面。在民事层面，鼓励被骗单位、机构、公众提起侵权诉讼，要求造假者返还非法所得并赔偿经济损失，通过“追赃挽损”让其付出经济代价。在行政层面，市场监管部门可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》，对利用虚假头衔进行商业宣传的企业予以高额罚款，切断造假者与商业机构的利益勾连。

四是推动社会认知回归理性，破除“唯头衔论”。一方面，推动学术评价回归本质，建立以成果质量、实际贡献为导向的评价体系，淡化头衔附加的功利价值。例如，科研项目评审中，弱化“院士”等身份的权重，强化同行评议与成果创新性评估。另一方面，媒体与教育机构应引导公众理性看待学术荣誉，宣传科学精神与求真务实的价值观。院士是追求真理的表率，而非“特权象征”。唯有破除“唯头衔论”，让社会关注真才实学，造假者才会失去生存空间。

总之，根治假院士乱象，既需要制度创新的硬约束，也离不开价值重构的软约束。当科学精神回归本位，当社会评价摆脱“头衔崇拜”，那些靠虚假头衔招摇撞骗的“南郭先生”终将失去生存土壤。这不仅是维护学术尊严的需要，更是构建诚信社会的必然要求。

小朋友“教科书级救援”的启示

◎ 关育兵

据媒体报道，近日，在辽宁沈阳一餐厅内，11岁女孩胡紫涵用精准的海姆立克急救法从窒息女子气管中撞出异物；在河北唐山，8岁男童在关闭的电梯里含泪背诗自励、沉着报警自救；在辽宁锦州街头，一少年在雨中借来扩音器指挥交通，为救护车开辟生命通道；在上海至乌鲁木齐的列车上，一名13岁男孩带着急救包，熟练地为受伤乘客包扎……这些“小孩哥”和“小孩姐”，在千钧一发之际以超越年龄的镇定与专业能力，为“教科书级救援”写下新定义。

面对突如其来的险情，这些孩子展现出来的，不仅有本能的勇敢，更有训练有素的冷静。胡紫涵四次急救培训经历，电梯男孩“按警铃、报位置”的清晰步骤，列车少年对急救包的熟练使用……这些无不表明，他们在关键时刻的操作，是应急知识内化于心后的本能反应。此种冷静是习得之能，非天降之才。

这更揭示出安全教育需从孩子抓起的重要性。急救之技可自保，亦可保人，是每个生命应具备的“护身符”。胡紫涵作为辽宁省红十字会急救救护宣讲团的小成员，早已将急救知识内化为救人于危难的力量。反观现实，我国应急教育普及率不高，很多成年人没有掌握海姆立

克急救法。当辽宁锦州雨中“小孩哥”指挥交通时，许多成年司机却不知所措……这种鲜明反差，正是全社会应急教育缺位的鲜明反映。普及此类教育，不是额外负担，而是文明社会护佑生命尊严的基石。

一些孩子在危急时刻爆发出的惊人能力，更是对“儿童只是被动受保护者”这一传统观念的颠覆。孩子一旦获得知识赋能，同样可以成为他人的守护天使。

普遍开展应急教育，刻不容缓。我们与其一次次为新闻中的“小英雄”惊叹，不如扎实推动急救、避险等生存技能全面融入基础教育体系、国民教育体系。当应急教育不再是特殊技能而成为国民素养，当每个孩子都能在课本与演练中习得守护生命之道，“小孩哥”“小孩姐”们的“教科书级救援”表现，将不再仅是新闻中的亮点。从孩子小时就普及应急教育，扎扎实实让他们掌握急救知识和技能，是每所学校和每位家长都应有的自觉。当急救知识化为本能，勇气便有了最坚实的支点。

当然，每个成年人更要自学急救技能，做生命的“守护者”，让每次意外不再是绝望的深渊，而是成为照亮人性光辉的一个个“教科书级救援”时刻。

影视剧字幕要经得起“咬文嚼字”

◎ 张立美

近日，正在热映的国产二维动画电影《浪浪山小妖怪》因一处字幕用词引发关注。有网友指出，影片中取经小分队打死老鼠精后，一位大娘在赠鞋时说道“你们走远路，废鞋”，字幕中将此处表述为“废鞋”，而网友认为正确写法应为“费鞋”。对此，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张三夕在接受采访时指出，从语言逻辑和日常用法来看，“走远路”搭配“费鞋”更为合理，““费鞋”是指鞋子容易被耗费，而“废鞋”强调鞋子已废弃，与‘走远路’的语境不匹配”。

热映电影字幕出现错别字不是个例。今年1月底，《哪吒之魔童闹海》上映后，就被网友指出存在多处错别字：成语“魂飞魄散”被误写成“魂飞破散”，角色鹿童的台词“休养几日”被错写成“修养几日”；角色太乙真人的台词“虽抗下了天劫”中的“抗”字被影迷质疑使用“扛”字更恰当；影片中“邪道外门”应为“邪道至门”，“惹事生非”应为“惹是生非”……

电影字幕出现错别字，看似只是小错误，其实，对社会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不可小觑。特别是像《哪吒之魔童闹海》《浪浪山小妖怪》这类深受青少年喜爱的热映电影字幕存在错别字，不仅破坏影视作品的整体美感，还可能给青少年观众

造成误导，影响他们正确、规范地书写汉字。

电影字幕不时出现错别字，直接原因无疑是字幕工作人员的相关知识素养欠缺，或工作态度不够认真，没有“走心”，没能及时发现字幕有错别字。但归根结底，是电影制作方对字幕工作重视程度不够，没能完善审核编辑机制。

字幕是影视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承载着传递对白信息、辅助观众理解剧情的作用，理应认真对待、规范使用，不该出现错别字。影视行业需要强化自律，影视工作者尤其是字幕工作者应当站在文化传播者的高度，本着精益求精的精神，以严谨的态度，对字幕内容进行严格审核编辑，尽最大可能避免出现错别字，这也是确保影视作品高质量应有的工匠精神。

监管部门则需要强化规范管理，应当像规范电视剧字幕一样规范电影字幕，参照电视剧过审标准，明确电影字幕出现错别字的上限标准，倒逼电影制作方自觉重视文字的规范使用，严格管理字幕审核等后期制作环节，完善校对流程，提高工作人员的文化素质，聘请专家审核等。总之，影视剧字幕要经得起“咬文嚼字”。

音乐版权保护行动不能“慢慢飞”

◎ 郭元鹏

“亲爱的你慢慢飞，小心前面带刺的玫瑰……”歌曲《两只蝴蝶》曾火遍大街小巷。近日，“《两只蝴蝶》下载2亿多次，作者挣了5000元”话题备受网友关注，此前有网友表示《两只蝴蝶》词曲作者牛朝阳凭这首歌赚了2个亿。8月15日，牛朝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，2004年《两只蝴蝶》火了后，他曾授权给帮自己录制过专辑的一家公司，从而拿到5000元，“签的合同应该是3年或5年，现在早就过了合约年限，这是《两只蝴蝶》唯一一次授权”，它从头到尾带给自己的全部收入仅为5000元。“最近很多人问我为什么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”

当《两只蝴蝶》2亿多次下载量的惊人数字被曝光，词曲作者牛朝阳却坦言只收到5000元版权费。这组数据对比如冰火相撞，瞬间将音乐版权保护的脆弱现实暴露于阳光之下。

2亿多次下载量与5000元版权收益的悬殊背后，是数字传播时代版权收益分配机制的严重扭曲。这首歌曲，曾如蝴蝶般在网络空间轻盈飞翔，而版权收益却如陷泥沼。牛朝阳平静道出的“大街小巷都在播放”的《两只蝴蝶》带给自己的全部收入仅为5000元，不只是个体创作者的叹息，更是对版权保护制度漏洞的

遗憾。

版权保护行动如果像《两只蝴蝶》中所唱的“慢慢飞”，歌迷便难以听到更多好音乐。牛朝阳一句“如果这个行业挣不到钱，创作者就变少了，基数变少了，好歌也就变少了”，就是对这种行业生态的清醒预言。当版权保护无力守护创作者的热情，无异于断了创作好歌的“活水源头”。

值得庆幸的是，牛朝阳最近在两个音乐平台上传了两首新歌，“点击量不高，但上个月一个平台给我分了8元钱，另一个分了350元，是自动结算的，相当于有多少人听了这首歌或者有多少人使用这首歌当背景音乐，都会给我钱。”这两首新歌在平台获得的自动分账收益虽微不足道，却似一缕微光，照见版权保护体系逐渐构建了起来，不需要原创者到处去维权了。

当创作者需要追着版权跑，好音乐只能“慢慢枯萎”。牛朝阳那“2亿多次下载量与5000元收益”的悲情反差，是过去时代的疮疤，更应是今日奋起直追的号角。我们需告别版权保护“慢慢飞”的被动与无力，让版权保护“快快飞”，让原创回报精准抵达，唯有如此，音乐创作的森林才能生生不息。



装模作样 王怀申作